

马克思对李嘉图定律的破解及其当代价值

兰 洋

摘要 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李嘉图定律的破解是隐含其中不可或缺的任务。李嘉图定律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动能、代价和未来前景最为清晰且简明的表述。通过破解这一定律,马克思深刻洞察了资本主导下的近代世界秩序所呈现的双重结构,揭示了资本逻辑主导下现代世界秩序诞生的真正动因和对抗性本质,否定了资本主义国际法权的天然正当性,进而提出了基于“真正共同体”的未来世界图景。研究这一思想扬弃过程,有助于我们深刻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世界秩序的看法,并充分挖掘其中蕴含的新发展观、新合作观、新历史观和新文明观。

关键词 世界秩序;李嘉图定律;历史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 B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5)02-0069-08

基金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4LLZXB034)

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大卫·李嘉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李嘉图作为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构成了马克思一生的理论敌手和重要坐标。在一定程度上,马克思是在由拒斥到接受再到扬弃李嘉图学说的过程中,进入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层空间,而对李嘉图定律的破解又是这一思想交锋中一个十分关键却长期被忽视的论域。如果说李嘉图定律是古典经济学对资本主义世界秩序(world order)的集中表达,那么,马克思则打破了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在国际领域的正当性预设,实现了世界秩序叙事的根本性变革。充分理解这一点,既可以帮助我们开拓马克思的思想意蕴,也有利于我们回应现实问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马克思与李嘉图定律的相遇

马克思生活的 19 世纪是世界秩序由局部走向整体的关键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先是经历了自由竞争时代的繁荣与危机,而后又逐步迈向垄断形态。在此过程中,资本主义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也造成了等级化的世界秩序、惊人的贫富分化和系统性的剥削关系。特别是两次工业革命推动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不断延伸,将几乎所有国家和民族卷入其中。与此同时,西方列强加紧了对世界其他民族的疯狂掠夺,使得全球范围内的矛盾冲突越演越烈。这就决定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必须具有更为宽广的视野,由单一社会走向世界秩序,借助科学历史观系统分析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生发历程、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进而为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的普遍幸福指明新的方向。事实上,马克思也正是这样规划了他的研究计划。比如,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概括了他预备研究的五个部分:(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2)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到了 1859 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强调:“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1](P588)这里的后三个因素便是世界秩序的直接内容,它们构成了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线索,也成为解剖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环节。综合上述写作计划,马克思深入政治经济学批判时,就是以世界性而非单一民族国家的视野透视资本主义性质的。资本就其本性而言是一种世界性的力量,资本的拓展必然要求建立符合其需要的世界秩序。反过来讲,近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和发展则是资本实现自身的历史过程。当然,马克思后来为了集中论述资本的一般性质而暂时在结构上搁置了对世界秩序及其构成要素的讨论,因而在《资本论》四卷的格局中并没有出现对应的明确章节。但这并不代表马克思放弃了在资本扩张与世界秩序之间建立逻辑联系,这一论题始终广泛地分布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在内容上形成了一种具有范式意义的整体性逻辑。

值得注意的是,当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延展至世界维度时,他首先面对的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言中,马克思就坦承:“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21](P111)其后,马克思经过深入研究确认古典政治经济学经过从威廉·配第到亚当·斯密的发展,在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达到了顶峰:“在李嘉图那里,政治经济学无情地作出了自己的最后结论并以此结束。”^[31](P455)这种理论发展的一个显著成就就是李嘉图定律的提出。李嘉图定律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运转方式和价值观念作了最为清晰且简明的表达,表明“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41](P16)。在被古典政治经济学视为禁区或者说被其遮蔽的地方,正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显身手的舞台。因此,超越李嘉图定律意味着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话语逻辑和理论空间,理解李嘉图定律也就成为进一步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先决条件和重要切入点。通过理论回溯,就李嘉图自身的表述而言,我们看到了李嘉图定律包含的三个理论要件。

第一,资本创造的生产力构成世界秩序不断拓展的主要动能。李嘉图在魁奈和斯密的基础上,以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和世界市场为背景,强调分配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李嘉图认为,在生产力增长的主要要素——土地、人口和资本之中,只有资本才是持续增长真正的源泉。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区别于古代一切区域秩序的关键因素,就在于它形成了资本支配土地和人口的积累模式,能够借助国际贸易将利润源源不断地从农业国家转向握有资本的国家,从而可以无止境地增加财富。这一点在作为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英国体现得最为明显。正如李嘉图指出的:“达到了增加资本和增加人口限度”的国家,“借助于国外贸易,……也可以无止境地继续增加财富和人口”^[51](P165)。简言之,李嘉图定律的第一要件表明: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突破民族的和地域的局限源于生产力的提高,而他对生产力的独特理解又依赖于资本创造的国际贸易以及随之而来的新分配体系。

第二,生产力的进步与世界秩序的拓展必然要牺牲某些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李嘉图认为,正如在动植物界,种族的发展要以牺牲个体而为自己开辟道路;在人类历史中,世界秩序的建立和扩大也必然伴随着部分民族和国家的苦难乃至消亡。在古代社会,国家间秩序的达成往往依赖于政治霸权、军事征服和民族奴役,典型样态是罗马式的帝国和平(PaxRomano)。李嘉图认为,到了现代社会,资本扩张取代了政治—军事强力成为推动世界秩序的主导力量。资本主义的崛起虽然牺牲了那些单纯依靠土地和人口的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却是最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一种生产方式,而且相较于古代更加文明,因而从整体利益上看,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合理的、符合人类进步的必然规律。事实上,李嘉图真正看重的是作为整体的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曾经评价道:“对李嘉图来说,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究竟是毁灭土地所有权还是毁灭工人,这是无关紧要的。”^[61](P127)遵循同样的逻辑,只要能够增加工业资本国家的利润,从而进行更大规模的积累,那么落后国家的牺牲就是历史进步的必要成本。这种理论实际上为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中存在的剥削性与等级性作出了辩护。李嘉图并不考虑资本产生利润这一现象本身是否合理,而是直接假定:既然资本是推动生产力的主体力量,那么它也就必须是最大利益主体,否则以资本为中心的增长过程必然中断。简言之,李嘉图定律的第二要件表明:资本的自由是人类发展的合理结果,是现代世界秩序存续的基石和应然理由。

第三,建设更加理想的世界秩序依赖于国际贸易的相对优势。虽然李嘉图认为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在运行规则上是绝对合理的,却不否认其在具体形式上还有进一步完善的可能性。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七章“论对外贸易”和第二十五章“论殖民地贸易”中,李嘉图基于国际贸易的相对优势理论提出了世界秩序的未来构想:首先,每个国家应该根据禀赋的相对差别,找到可用于出口的成本较低的商品类型;无论是生产力强的工商业国家还是落后的农业国家,无论是宗主国还是殖民地,只要集中生产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用以和他国进行交换,贸易双方就能实现利益最大化。其次,对外贸易中会发生交换不公平的现象,但是当一切生产要素能够不受阻碍地自由流动时,即使财富在各国之间的分配是不均等的,总体而言仍优于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此外,可以通过调节货币(贵金属)数量的方式,调节各国商品的自然价格,从而推动世界各国的均衡化发展。最后,经过改良后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能够实现“人类的普遍幸福”,“最能保障整体利益的莫过于把总资本作最有利的分配,也就是实行普遍的自由贸易”^[7](P292);资本主义“使劳动得到最有效和最经济的分配”^[7](P111),从而增加生产总额,国际贸易是使世界各民族结合为统一社会的“共同纽带”。简言之,李嘉图定律的第三要件表明:资本主义世界秩序虽然有缺陷,但是经过一定改良,仍是各国间进行资源配置的“最优方案”。

从李嘉图定律的内容不难发现,这一定律表征了处在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对世界历史的发生过程和秩序结构的基本认知。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视域中,世界秩序在本质上既非基于共同信仰和相互友爱而形成的理想共同体(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也不是基于残酷的“自然状态”而组建的政治联盟(霍布斯的利维坦),而是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国际交换中形成和拓展的。这一基本认知无疑构成了马克思思考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核心对象。如果说李嘉图定律的提出是为了证明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集中体现的是资产阶级法权在国际领域的绝对正当性,那么马克思则打破了资本主义具有“超历史性”的神话,对资本主义所主导的“三个从属于”的等级性结构提出了根本的质疑。一言以蔽之,破解李嘉图定律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任务,也是马克思关于超越资本主义的新世界秩序的集中表达。

二、马克思对李嘉图定律的破解

马克思对李嘉图经济学的认识贯穿了其思想历程的大部分时间。在《巴黎笔记》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初次接触并谈及李嘉图经济学;在《神圣家族》《评李斯特》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认识到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价值,并在《哲学的贫困》中对李嘉图所作贡献进行了肯定。到此时,马克思对李嘉图的评价总体而言是趋于积极的。而后,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开始洞察李嘉图的理论困境并作了正面批判^[8];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剩余价值的发现而超越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最终完成了对李嘉图经济学的全面审视和彻底扬弃。回顾上述思想进程,对李嘉图定律的破解是隐含其中的、不可或缺的任务。只有破解了这一定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才是完整和彻底的。反过来说,以李嘉图定律为对象,我们能更清晰地理解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扬弃,也能更好地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世界秩序的看法。

首先,马克思完善和发展了生产力理论,揭示了资本逻辑主导下现代世界秩序诞生的真正动因,强调生产力是历史演进的根本动能,这是马克思与李嘉图的相同之处。可以说,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直接促使马克思发现物质资料生产在人类历史中的基础性作用。不过,马克思对生产力的理解远远超越了李嘉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以人类社会生产为语境,从具体形式中明确抽取出生力的一般性定义:生产力被界定为人类社会在劳动生产中形成的主体与客体力量的总和,并且“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2](P567-568)。当然,这一阶段的马克思仍然受限于政治经济学的分工概念,尚未完整揭示出现代世界秩序的建立与资本结构化的同构过程。到了1851年的《关于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赋税原理〉》中,马克思首次提及“资本的生产力”概念,开启了从一般物质生产逻辑到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转向,尤其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一切社会生

产能力都是资本的生产力,因此,资本本身表现为一切社会生产能力的主体。”^[9](P587)此时的马克思已洞见,仅从生产力的普遍定义出发无法全面把握现代世界秩序的特殊属性,必须将后者置于资本逻辑的语境之中,揭示资本的深层内核展开为世界秩序浅层表现的历史过程。资本为了保障自身的增殖,必然要冲破地域限制,形成涵盖广大地域的世界性体系。这套系统在国家内部表现为统一的国内市场和民族国家的集权化过程;在世界范围内则表现为国际分工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全球秩序确立。这里要说明的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生产力”与李嘉图定律第一要件之间存在着本质性的区别。李嘉图将现代世界秩序的建立等同于资本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其潜在前提是按照商业和贸易的思路理解资本,他没有看到,资本的本性不是简单的贸易关系而是一定的、历史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则超越了单一的贸易视角,将资本的产生与统治力锁定在生产的全过程之中。正如《资本论》揭示的,资本是一种总体性的、结构化的力量,是“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全部的生产要素必须通过资本才能组合在一起。这一过程中的各个国家和民族,无论处在资本循环链条的何种位置,都是经济范畴的具象化,都必须服从资本这个大写的“主体”。简言之,马克思对李嘉图定律的第一重突破在于发现了资本具有的自组织结构。在李嘉图定律中,资本主义的特殊性被国际贸易中交换价值量的单纯扩大所遮蔽。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独特性质在于国际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转移。这意味着国际贸易不能被简单理解为单纯的商品流通,而必须被视为资本这一特定的社会关系的国际拓展。李嘉图的局限在于:他只是侧重于在物性的流通层面考察这一过程,而没有看到资本在宏观生产与流通的全部环节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所以,李嘉图是在物的意义上界定资本,马克思是在社会关系的层面上理解资本。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资本变成一个集合主体”^[10](P45)或“资本主义关系直接就是权力关系”^[11](P177)。简言之,资本永无止境地追求自我增殖、空间扩展和权力扩张,构成了现代世界秩序建立和扩展的真正动力。

其次,马克思揭示了现代世界秩序的对抗性本质,否定了资本主义国际法权的天然正当性。正如李嘉图定律表明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具有等级性和剥削性特征。对此,马克思给予了赞扬:“李嘉图的冷酷无情不仅是科学上的诚实,而且从他的立场来说也是科学上的必要。”^[6](P127)但是,李嘉图的错误在于将这种由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决定的国际法权视为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把国家间的对抗性变成“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9](P28)。这样一来,李嘉图就遮蔽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的规定性,从而得出了“历史进步注定要牺牲某些民族和国家”的结论。马克思则在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扬弃了上述非历史性的设定。一方面,正如《哥达纲领批判》所指出的,国家间的压迫和阶级间的压迫一样,是人类的特定阶段的产物。具体地说,现代世界秩序中出现的种种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殖民掠夺,根本上源自资本的自我增殖和空间扩张所形成的权力关系。这种资本对外扩张掠夺的“同化—分裂”逻辑催生了民族国家之间的“中心—边缘”支配结构。因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着重强调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1](P592)另一方面,现代世界秩序的对抗性之中又生长着自我超越从而走向非对抗的可能。正是由于世界市场使民族国家内部的支配逻辑演变成世界范围内“殖民逻辑”,因而无产阶级完成自我解放就与实现民族平等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国际社会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并不具有抽象性质,这种牺牲弱者的状态只是人类历史的特定阶段,必须在未来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加以消除。正如马克思所说:“要使各国真正联合起来,……就必须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2](P694-695)社会主义运动为世界提供了一条新道路,即打破资本统治下的国家“中心—边缘”结构,追求各民族各国家的独立自主和平等合作。它改变了国家关系由强权决定的历史,将各国无论大小强弱平等地参与国际事务作为价值诉求。简言之,马克思对李嘉图定律的第二重突破在于,他看到了打破资本的统治与破除国家间的等级制之间的内在关系,主张将超越资本权力作为终结国家间对抗的“史前状态”的必经之路。

再次,马克思批判了李嘉图的国际正义观念,指明了各国各民族交往应当遵循的真正原则。在李嘉图看来,所谓的国际正义的内涵是:满足抽象国家的一般权利即自由贸易;最大程度上发展生产力的总量;在前两项基础上以相对优势理论论证国际交换能够实现普遍互利。马克思则深刻洞察了这种正义观念的内在矛盾性。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经济既是一种目标垄断性经济,又是一种过程性竞争经济,在这一积累/分配模式中,落后国家“从每一个工业部门找出几个特殊品种的生产,把它们跟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中一般消费品的最廉价的生产等量齐观,这真是太可笑了”^[12](P758)。资本主义国际贸易不是李嘉图所说的日益趋向平等的共同利益关系,而是世界各国之间不对称的依附关系。这样一来,马克思就打破了李嘉图理论的盲区,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难题:被剥削的阶级、民族和国家如何实现正义。这一命题表明国际正义的核心内容发生了重大变革:应当被讨论的既不是抽象国家的一般权利,也不是交换中自动实现的互利,而是现实中被剥削国家的具体权利和正义原则。由此,正义作为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也就突破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外衣,转而将维护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发展权利作为国际正义的真实意义。真正的国际正义是国际参与主体之间展开平等、互信的协商与合作,反对秘密外交与精英外交,是以全球无产阶级共同利益为目标的公开外交。马克思给国际社会的应然性存在提出了基本准则:只有全球范围内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彻底变革,一种表现为平等互惠、公开互信、团结合作的真正的国际正义才可能最终形成。

最后,马克思揭露了李嘉图自由贸易构想的虚假性,提出了基于“真正共同体”的未来世界图景。李嘉图寄希望于通过自由贸易改良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从而实现“人类的普遍幸福”。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构想带来的不过是虚假的“共同体”,丝毫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等级性的秩序结构和征服性的权力逻辑。恩格斯就曾回忆,早在1848年《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马克思就指出,资本主义“无论是实行保护关税制度还是实行自由贸易”,都是资本增殖的自我循环,“最终都没有差别”^[12](P350)。同时,马克思还对李嘉图的理论进行了历史性的还原。所谓自由贸易,其实是基于英国的历史经验和利益需要提出的,最终也是为英国这类资本主义核心国家服务的。在《鸦片贸易史》中,马克思深刻揭露了英国主张自由贸易的实质:“只要我们注意考察英国的自由贸易的性质,我们几乎可以处处看到,它的‘自由’的基础就是垄断。”^[13](P591)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贸易自由或者垄断性的保护主义其实是一体两面,是不同利益集团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对生产体系进行调节的手段。因此,基于相对优势的李嘉图的自由贸易学说并未跳脱资本的统治框架,解决不了现代世界中存在的两极分化和高度不平等,更无法为各国各民族带来整体进步。

与此相对,马克思则力求基于公平正义的原则建立人类社会“真正的共同体”,将李嘉图经济学视域中的国际法权问题转换为“人类解放”视域中的“自由人的联合体”问题。概括地讲,这一共同体具有如下规定:第一,共同体的前提是生产力的发展,但这种发展不是以牺牲某些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的,而是建立在各民族形成共同利益并把自由发展的条件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其重点是逐步消除国际分工具有的剥削和支配性质,推动各民族以平等合作实现整体性的进步。第二,共同体的核心是驾驭资本。资本的本性促使它支配整个世界,将更多人口和资源转化纳入其中,这是近代以来的世界各国贫富分化冲突的总根源。因此,新的共同体必须打破资本对内主宰整个社会、对外扩张掠夺全世界的链条,彻底转变以外部分性、等级制和虚拟化作为特征的积累方式。当然,这不意味着完全否定资本的历史作用。实际上,在马克思的视域中,新世界秩序的核心动能在于驾驭资本,即一方面继续发挥资本发展生产力、推动各国普遍交往的文明作用;另一方面扭转资本的无序扩张所带来的生产过剩危机,遏制资本的增殖本性和权力布展所造成的贫富分化和系统性冲突。第三,共同体的显著特征是超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正如《共产党宣言》揭示的,资本的全球扩张催生了国家间的不平等关系——以三个“从属于”为特征的权力支配结构。马克思主张的新世界秩序则要求废除资本对劳动、强势民族对弱势民族、列强争霸等在内的冲突性关系,打破旧秩序蕴含的资本逻辑、帝国逻辑和殖民逻辑,促进世界秩序向着更加

合理和公正的方向变革。最后,共同体的现实载体是社会主义。马克思认为,在社会主义出现前的一切社会制度最终都显示出生产力发展成果和人类普遍福利之间的巨大鸿沟。与此相反,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促使生产力发展和人的发展趋向真正统一。如果说资本主义世界秩序是一套支配性的关系结构,其出发点是少数国家权力和利益最大化,那么在革命和建设不断壮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则将形成领导型的结构,它是将本阶级和本国利益同全人类的利益有机结合起来,统筹自身发展与世界整体发展的关系。简言之,马克思对李嘉图定律的三重突破在于,展开了一条通向更高级的世界秩序和文明形态的路径——在社会主义力量的引领下,实现各民族各国家的独立自由和共同发展。

总而言之,通过对李嘉图定律的破解,马克思深刻洞察到资本主导下的近代世界秩序呈现出一种双重结构:显性结构是霸权的不断转移和倒手;隐形结构则是始终不变的制度性剥削和国际性压迫。人类要摆脱相互对抗的“史前状态”,就必须建构全新的世界秩序。马克思的回答是:这一秩序的根本前提是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主要途径是社会主义运动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国家间的通力合作;伦理主张是消除贫困和战争,平等地尊重各国各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权利;最终目标是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世界长久和平和普遍繁荣。

三、马克思破解李嘉图定律的当代价值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古典政治经济学有着迥然不同的目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共同的目的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发现经济运行的规律,从而完成某种秩序的建立和改良。而马克思关心的则是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人类普遍的生存状况,致力于实现全体人类尤其是被压迫民族的自由解放。通过破解李嘉图定律,马克思开创了一条世界秩序转型的新路——以社会主义运动引领的平等化、协商性的世界秩序取代资本主义列强的霸权型、等级性世界秩序。由理论照映现实,当今世界正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弊端及矛盾更加凸显,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面对这一局面,人类面临两种前景之间的选择:一是受困于李嘉图定律之中,继续维持以强国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二是超越资本和霸权的统治,建立更加公平正义的世界秩序。毫无疑问,后者才是人类走向未来的必然选择。从现实性上说,进一步挖掘马克思破解李嘉图定律过程中蕴含的新发展观、新合作观、新历史观和新文明观,可以帮助我们更好把握今日世界秩序的本质,加深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探寻新型世界秩序的价值基础和现实可能。

首先,马克思对李嘉图定律的破解中蕴含着新发展观。李嘉图定律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理论上的反映,内在包含着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观。其核心表述是:生产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世界秩序的拓展和人类的整体发展被简单规定为生产的扩大和资本的积累。马克思则深刻揭露了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观必然导致的“进步悖论”：“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4](P743-744)。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提出新的发展观必须遵循的两大尺度——生产力尺度和人的发展尺度。前者是客观的标准,反映在科学技术的进步、国际贸易的扩大、全球经济的增长等方面;后者则是综合的尺度,它鲜明地体现为生产力的所有成果最终要通过世界各国各民族共同发展来反映,并以“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终极目标。按照马克思所指向的新发展观,发展绝不是少数群体、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而是尊重世界各国自主选择和平等合作的权利、追求人类整体福祉均衡化的发展。

其次,马克思对李嘉图定律的破解中蕴含新合作观。李嘉图定律深陷旧的零和思维之中,在“自由贸易”“自然权利”等抽象词汇的包装下,资本主义始终遵循丛林法则,无法应对人类的共同困境。马克思则通过破解李嘉图定律指出,人类社会必须从对抗走向合作,从独赢走向共赢,从损人利己走向互惠互利。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无产阶级革命的维度阐明了社会主义事业根本性质在于其世界历史性,主张超越地域、民族和国家的对抗性,构建世界范围普遍性的进步联合体。经过对李嘉图

定律的系统批判,马克思形成了关于国际合作的全新思想。其要点在于:(1)生产力跨越国家边界的生产活动推动世界相互依赖关系的形成,人类的普遍联系是国际合作的基础;(2)民族独立是“建立各民族和谐的国际合作的必要先决条件”^[14](P450),国际合作“只有在平等者之间才有可能”^[15](P261);(3)民族间的相互影响产生融合世界的共同利益,构成国际合作的连接点;(4)在社会主义力量的引导下,“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16](P117),无产阶级国际联合是国际合作的最佳形态。简言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指向了一条“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的人类合作发展新路径。

再次,马克思对李嘉图定律的破解中蕴含着新历史观。李嘉图定律集中体现了以霸权更迭为中心的历史观。而从马克思思想的高度透视近代历史,就会发现,虽然中心国家不断变更,但是不变的是世界秩序的一系列本质特征。比如,其权力基础始终是霸权国家的综合优势,其基本特征始终是“中心—边缘”的等级性结构,其软性支撑始终是排他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则提出,李嘉图定律的历史限度表明,平等化和普惠性是未来世界秩序的原则内涵。通过建立合作型的国际关系,彻底改变国际地位由单纯实力大小界定的现实,保障各国无论大小都能共同参与国际事务,人类才可能告别充满系统性冲突的“史前时代”,以人类的共同名义书写人类社会的历史篇章,实现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当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建设更加美好的人类社会需要经历从暂时的、局部的、不公平的、低层级的状态向持久的、全面的、公平的、高层级的状态演进。换言之,新型世界秩序既包含着超越性的维度,也具有阶段性的特征。就前者而言,人类解放的最终目标是解除根植于迄今为止一切文明本性之中的对抗性和压迫性,建构一种超越资本逻辑和霸权逻辑的新文明类型。从后者而言,通向真正的人类历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还必须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寻求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性与阶段性之间的辩证统一。归根到底,马克思认为,这种统一性和现实性取决于社会主义力量的出现和壮大。推动等级性、霸权型的世界秩序向平等化、协商型的世界秩序转型是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意义。

最后,马克思对李嘉图定律的破解中蕴含新文明观。李嘉图定律通过建构一整套抽象人性论话语,试图垄断国际基本规则的定义权和裁判权。这套话语系统的哲学支点是对抗性、霸权性的冲突文明观。通过批判李嘉图定律,马克思开创出共商、共建、共赢的文明交流全新图景。马克思从不寻求某种超越和统摄所有形态的唯一性文明,而是自觉追求不同文明体系间的良性互动。正如马克思所言:“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12](P164)这意味着人类实质性的进步依赖于互依性关系。在文明的大尺度上,这种互依性表现为:在价值原则上,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价值相融超越价值冲突、以互相尊重超越唯我独尊;在国家关系上,以平等格局破除“中心—边缘”的差序格局;在治理方式上,用对话协商方式弥合不同国家的利益分歧,实现合作共赢。

综上所述,马克思对李嘉图定律的破解是思想史上重大的理论创建,它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人类社会进步指明了重要的方向。站在马克思的思想高度观察现实,可以看到,以往的世界秩序并没有完全摆脱马克思批判李嘉图定律的理论范畴,它仍然内含着单一的发展观、单向的合作观、征服性的历史观、冲突性的文明观。因此,旧的世界秩序正日益丧失了引领人类发展进步的能力。与此相对,以社会主义的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整体性觉醒,开创了新的国际文明道路。无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大国关系、新安全观等重大理念,还是“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建设、金砖国家峰会等体制机制,都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指向,是更加公平正义的世界秩序的真实载体。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只有各国行天下之大道,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17](P62)。面对世界秩序的大变革大调整,我们应当立足马克思主义“世界之问”的科学回答,继承其世界历史的宽广视野、命运与共的关怀精神、平等交往的价值理念、公平正义实践指向,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紧密结合起来,推动各国各民族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不断推进多边合作机制,携手塑造“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18](P58-59)的世界。一言以蔽之,这是马克思对

李嘉图定律的破解能够给予我们的当代价值和重大启示。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斯拉法·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 [7] 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 [8] 张一兵.马克思:“李嘉图笔记”与李嘉图难题——《伦敦笔记》中经济学思想实验研究.求是学刊,2022,(1).
-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0] 罗伯特·阿尔布瑞顿.政治经济学中的辩证法与结构.李彬彬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 [11] 安东尼奥·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孟丹、王巍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7]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18]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On Marx's Dismantling of Ricardo's Law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Lan Ya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In Marx'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he dismantling of Ricardo's law is an implicit and indispensable mission. Ricardo's Law is the clearest and most concise articulation of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about the dynamics, costs,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the capitalist world order. By unraveling this law, Marx acquired a profound insight into the dual structure of the modern world order dominated by capital, by revealing the real motivation and antagonistic nature of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order under the dominance of capital logic, and denying the natural legitimacy of capitalist international legal rights, and proposed a vision for the future world based on a real community. To study this process of ideological sublation will facilitat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n world order, and intensive exploration of the new concepts about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embedded therein.

Key words world order; Ricardo's law;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作者简介 兰 洋,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当代政党研究平台研究员,北京 100872。

■ 责任编辑 涂文迁